

继往开来的 东南学术

——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

莫砺锋 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术团队丛书

继往开来的 东南学术

——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



莫砺锋 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继往开来的东南学术: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 /
莫砺锋主编.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术团队丛书)
ISBN 978-7-305-06554-5

I. 继… II. 莫…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文集 IV. 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2138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术团队丛书
书 名 继往开来的东南学术——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
主 编 莫砺锋
责任编辑 马蓝婕 编辑热线 025-83594071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25 字数 388 千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6554-5
定 价 50.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025-83686452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南京大学及其前身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矗立在虎踞龙蟠的金陵古都已经一个多世纪。一个多世纪以来,南大人践行“励学敦行、诚朴雄伟”的校训,锻造出一股奋发向上、历久弥新的“南大精神”。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历程中,俊彦群集、英才辈出,闪烁着一群星光熠熠的名字:郭秉文、陶行知、李叔同、黄侃、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吕叔湘、陈白尘、柳诒徵、顾颉刚、宗白华、汤用彤、马寅初、孙本文、钱端升、楼光来、梅光迪、吴宓……这些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巨擘大师和众多兢兢业业、默默耕耘的前辈学者一起,不仅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作出了杰出贡献。

虽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院系调整和“文化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延缓了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实力及发展进程,但踏实为学、不断创新的探索精神一直薪火相继,也正是这种精神激励、鼓舞了众多学者在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贡献:以胡福明老师为主完成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直接引发了全国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重大贡献;匡亚明先生主编的200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历时20年整体出版面世,被誉为世纪之交“规模最大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工程”;程千

帆先生主编的《全清词·顺康卷》共20卷的出版亦经历了20年,成为填补学术空白的基础文化工程;王绳祖先生主编的10卷本《国际关系史》,成为我国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周勋初先生领衔校注的1500万字的《册府元龟》,是迄今中国学者采用新式标点和科学整理方法完成的最为宏大的单本古籍整理工程;张宪文先生主编的300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张柏然先生主编的1200万字的《新时代英汉大词典》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自主研编、具有原创性的大型英语工具书。除上述鸿篇巨制的学术成果外,一批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成果也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为在中国的新时期和南大的新百年中再创辉煌,为将优秀的南大精神发扬光大,为培育出一批学风端正、能力突出、创新开拓、占领学术高地的学术群体,南京大学于2008年遴选出了首批8支“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术团队”。

这8支“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术团队”分别是:以莫砺锋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团队,以丁帆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团队,以张宪文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中华民国史研究团队,以张异宾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研究团队,以洪银兴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团队,以赵曙明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人力资源研究团队,以王守仁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英语语言文学研究团队,以周晓虹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社会学与中国研究研究团队。8支优秀学术团队是目前南京大学文科发展水平较高,发展速度较快的科研团体。各支优秀学术团队组织结构合理,人才梯队井然有序,既有几位德高望重、学识深厚的学术带头人,又有一些年富力强、著述颇丰的学术中坚,也有一批大有潜力、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这些学术团队积极进取、

勇攀高峰,继承和发扬了南京大学以及各自学科的悠久历史、精神传统,在新时期国家建设中积极奉献、勇于进取,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在教学科研中不断创新,为南京大学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现为进一步宣传这些优秀的学术团队,鼓励更多的科研人员加入到这种科研模式中来,以更加有效地集聚和整合学科力量,我们推出这套8卷本的《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术团队丛书》。本丛书的出版,便是这些团队近几十年来所取得的部分代表性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我相信该丛书的出版,既能让学界进一步了解南京大学文科核心团队的学术风采,也能促进团队的创新与发展。

洪银兴

2010年12月10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发展及其经验

一、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史	003
二、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特点	007
三、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发展心得	012

第二部分 代表论文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程千帆	021
叙《全唐诗》成书经过/周勋初	035
刘师培以唐诗证史/卞孝萱	051
论后人对唐诗名篇的删改/莫砺锋	073
《诗序》考/徐有富	087
中国文学批评的抒情性传统/张伯伟	103
王士禛扬州词事与清初词坛风会/张宏生	124
“符祐”考	
——论割并年号及其相关的构词问题/程章灿	141
论《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巩本栋	158

“桃源犹有晋时村”

——中古庐山隐风与后代遗民诗境/曹虹	180
历代论文赋的创生与发展/许结	191
西汉武、宣两朝的国家祀典与乐府的造作/徐兴无	209
欧阳修诗歌创作阶段论/严杰	220
《旧唐书》误校辨析/武秀成	233
《列子·杨朱篇》的时代及杨朱思想/赵益	241
从组织结构看《列女传》的叙事/俞士玲	268
《施公案》新考/苗怀明	284
课读图与文学传承中的母教/徐雁平	302
曾巩佚作辨证、补遗及其来源考述/金程宇	321
论初期五言诗的“四言格调”/孙立尧	336

第三部分 著作简介

程千帆著《程千帆全集》	353
周勋初著《周勋初文集》	355
卞孝萱著《唐人小说与政治》	357
莫砺锋著《唐宋诗歌论集》	359
徐有富著《诗学原理》	360
张伯伟著《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	362
张宏生著《江湖诗派研究》	364
程章灿著《赋学论丛》	366
巩本栋著《辛弃疾评传》	368
曹虹著《中国辞赋源流综论》	369
许结著《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	370

徐兴无著《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	372
严杰著《唐五代笔记考论》	374
武秀成著《〈旧唐书〉辨证》	375
赵益著《六朝神仙道教与文学》	377
俞士玲著《西晋文学考论》	378
苗怀明著《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	380
徐雁平著《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	381
金程宇著《域外汉籍丛考》	383
周勋初主编,姚松、武秀成副主编《册府元龟(校订本)》	384
南京大学中文系《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编《全清词·顺康卷》	
张宏生主编《全清词·顺康卷补编》	386
张伯伟主编,许结、朱恒夫副主编《中华大典·文学理论分典》	389

第 一 部 分

**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
学科发展及其经验**

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历史悠久,许多学术大师如黄侃、吴梅、胡小石、汪辟疆、陈中凡、罗根泽等执教于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程千帆、周勋初、卞孝萱等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承续“东南学术”的优良传统,以新知益旧学,经过长期的建设,形成了文献考证和文艺批评相结合、文史贯通的治学方法和研究特色,传承着严谨踏实的学风。近十余年,本学科实现了老一辈学者到中青年学者的交接,形成了以莫砺锋教授为学术带头人,以张伯伟、张宏生、程章灿、巩本栋、许结、曹虹、徐兴无等教授为核心力量的学科团队。现简述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史、学科特色和发展心得如下:

一、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史

中国古代文学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学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史与南京大学的校史同步。因不满书院制教学,且受西方现代教育制度的启发,1901年,清政府下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经江苏士绅张謇、缪荃孙等斡旋,1903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京建立了“三江师范学堂”作为省城“大学堂”。学校设立“修身”、“历史”、“文学”等十八门课程,由王澐(伯沆)讲授中国文学,此为本科的远源之一。

1913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发文江苏省,“准就两江师范学校校舍改设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开始招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不再是江苏、安徽、江西之“府学”,而成为南方的高等学府。南高师校长江谦《关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办状况报告书》(1915年8月)谈及当时“录取学生资格之状况”：“最多者为江苏,其次则安徽、浙江、江西,其次则广东、四川、贵州等省。”学校设预科、本科、研究科、专修科和选科。国文为预科必修课程;本科设有国文部;国文部并设国文专修科。之后本科之英文部亦开设“国文及国文学”,历史地理部亦开设“国文”。当时主国文部讲席者仍为王伯沆先生,但今存教员履历表中未见其名,因为先生以不受聘为条件,以保持传统士大夫的节义、师道和学术尊严。胡先骕先生回忆南高师时期:“文史诸科,名师

群彦，亦一时称盛。言国学则首推王伯沆先生之于文，柳翼谋先生之于史。……王伯沆先生主讲《四书》与《杜诗》，至教室门为之塞。而柳翼谋先生之作中国文化史，亦为吾国士夫所辨认。”柳诒徵“与王伯沆共晨夕，王喜谈诗，赣人胡先骕、邵祖平亦昵就”（《劬堂学记》）。

教育贵普及，学术贵大成。秉持这一理念，1920年4月，南京高等师范校务会议通过筹备国立大学议案，张謇等东南人士上书教育部正式陈请，同年12月，国务会议正式通过并定名为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在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规模上进一步扩充。1921年10月，国文系主任为陈中凡教授。据1923年1月《国立东南大学教职员一览》，当时国文系的教员情况是：陈钟凡，“国文系主任兼教授”；吴梅，“词曲国文教授”；陈去病，“诗赋散文教授”；顾实，“国文教授”；邵祖平，“国文助理”。依现在的学科分类，他们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成员。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后，1928年5月，学校易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据1930年《国立中央大学一览·文学院概况》，当时中国文学系教员有：汪东为副教授、系主任；黄侃、王伯沆、王易、胡小石、汪辟疆、吴梅为副教授，陈延杰为讲师，钱子厚、黄焯、张述明、黄文鸾为助教。可谓极一时之盛。除1935年黄侃先生病逝，其人员格局一直持续到1937年中央大学西迁重庆。

国立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期间，本学科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如成立国学研究会，刊发《国学论丛》，拟设“国学院”，组织词社、文会等。1920年、1921年，胡适先生来南高师、国立东南大学暑期学校讲课，并以研究国故为题发表演讲，北大的“整理国故”风气蔓延到南方。但自南高师起，南北学术即呈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格局，所以国立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的成立有与同校的《学衡》派互相声援而与北大抗衡之势，国学研究会的指导教授是陈中凡、顾实、吴梅、陈去病、柳诒徵五先生。1923年，《国学丛刊》正式发行，刊发刘师培、章太炎之文，实有承章太炎、刘师培《国粹学报》（自1905年）之意，是面对“整理国故”之潮时，国立东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教授在文化与学术上的选择。1923年4月，国文系计划成立“国学院”。在顾实起草并经国文系全体教授赞同的《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中，顾实提出整理国学要分“两观三支”。“两观”即“客观”和“主观”。“客观”包括：设立“科学部”，搜集各种古图谱、古器物，并编写专史和辞典，“以科学理董国故”；设立“典籍部”，对古

籍进行疏证、校理和重修工作,以证其真伪义理,“以国故理董国故”;设立“诗文部”,“非以理董往籍也,将欲以衡量现代之作品云尔。移风易俗,责无旁贷”,即“客观化之主观”。“科学部”近王国维等提出的以“两重证据法”研究国故,“典籍部”承传统之校勘、疏证之学。

顾实先生等因不满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旧文学的态度,提出创作诗文以“移风易俗”,其说虽遭北京大学国学门教授的抨击,但《国学丛刊》始终贯彻捍卫传统诗文的旨趣。该刊设立了“文录”、“诗录”、“词录”、“曲录”等栏目,刊载国学研究会师生和友朋的诗文作品。中央大学期间,本学科继续发扬诗文创作的传统。如1924年春,东南大学国文系师生组织词社“潜社”,由吴梅主盟。“月二集,集必在多丽舫,舫泊秦淮,集时各赋一词,词毕即畅饮”。1928年秋,吴梅重主潜社社集。教授们亦颇多文酒登临之乐。如1928年春,黄侃、胡小石、汪东、汪辟疆、王伯沆、王晓湘、王友箕等先生于上巳日修楔于玄武湖,并联句;1929年黄侃先生邀陈伯弢、王伯沆、胡翔冬、胡小石、汪辟疆、王晓湘等先生集南京鸡鸣寺豁蒙楼,并联句。

二十年代以来,本学科的这批学者被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贬称为守旧派,却取得了辉煌的学术业绩,也为中国现代学术史谱写了重要的篇章。如现代中国一批著名的词曲学者,唐圭璋、卢冀野、王季思、任中敏、钱南扬等都是吴梅的学生;现代中国一批著名的语言文字学者,陆宗达、殷孟伦、周法高、潘重规等都是黄侃的学生;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批著名学者,冯沅君、程俊英、刘大杰、胡云翼等都是胡小石的学生。王国维先生曾说,治学强分新旧,实为不学之谈。张其昀在《吾师柳翼谋先生》中认为:“民国八年以后,以南京高等师范为中心的学者,俨然以继承中国学统、发扬中国文化为己任。”“以继承中国学统、发扬中国文化为己任”,是对东南学风内在精神的精辟概括。

还需指出的是,这批学者在人格上也达到了崇高的境界,真正做到了道德和文章的统一。如王伯沆先生,日寇侵占南京前,因病未能随学校西迁,日伪闻其声誉,多次以伪职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坚决拒绝,以致饥病交迫,不幸去世。临终前,他要家人将其葬于家院之中,以示不与日本人之意,表现了崇高的气节。又如陈中凡先生始终以学术自任,1925年拒绝教育部长易培基请他出任江苏省教育厅长的邀请。又如有人以重酬请胡小石先生为蒋介石作六十岁寿序,遭严词拒绝。先生

们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以道自任的精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践履,与东南学风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1937年,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后,李长之、卢前、唐圭璋等先生任教于古代文学学科;1945年,罗根泽、朱东润先生随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并入中国文学系;1947年,陈匪石先生至中央大学任教。金陵大学虽是教会大学,但也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金陵大学国文系成立于1924年,长期以来,金陵大学的古代文学教授往往同时为中央大学教授。如金陵大学首任国文系主任胡小石教授,1925年兼任东南大学教授,1929年任中央大学教授而兼职于金陵大学,直至1937年。1946年两校回迁南京后,先生复兼任金陵大学教职。在本学科的著名学者中,仅胡翔冬、刘继萱两先生一直为金陵大学教授。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南京大学中文系和金陵大学文学院合并。由于极“左”政治日益严重,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干扰破坏了学术事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泛滥成灾,胡小石、汪辟疆等一辈学者被视作封建主义学者,而罗根泽等一辈学者被视为资产阶级学者,都遭到歧视或批判。六十年代,罗根泽(1960)、胡小石(1962)、汪辟疆(1966)诸先生相继去世,陈中凡先生也已年迈。“文革”结束时,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已甚为衰微。正在此时,程千帆先生应聘来南京大学任教,为本学科注入了生机。程先生求学于金陵大学,受教于黄侃、吴梅、胡小石、胡翔冬、冯国钧等先生,不但积累了深厚的学养,而且学到了老师们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由于程先生的学术基础是在南大打下的,由他返回母校来领导重振古代文学学科的工作,在学术渊源上与南大的传统天然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与此同时,由于程先生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逐步总结出一套特色鲜明的学术理念,由他来主持南大古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就有条件形成较为鲜明的学科特色。于是,在程千帆先生的主持下,南大的古代文学学科不但逐步恢复了元气,而且日益发展壮大。1981年,国务院学术委员会批准本学科为首批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1983年,教育部批准南京大学建立古典文献研究所。1988年,本学科被国家教委评为国家首批重点学科(2001年重新认定,2007年第三次评定)。八九十年代,老一辈学科带头人程千帆、周勋初先生在教学、科研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就,为弘扬本学科的优良学术传统树

立了楷模,为学科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学科顺利地实现了新老两代成员的交接,新一代学科带头人继承了前辈学人的治学精神,接过了领导学术建设的重任,形成了以莫砺锋教授为学术带头人,以徐有富、张伯伟、张宏生、程章灿、巩本栋、曹虹、许结、徐兴无等教授为核心力量的新的学科团队。

二、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特点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曾以“东南学术”之名驰誉海内外。八十年代以后,连续三次被教育部评定为国家重点学科,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重镇之一。其主要特色如下:

(一) 形成文献学与文艺学结合、文学与史学沟通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理念。

程千帆先生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呼吁运用“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后来他又用不同的说法来表述这一理念,如“搜集材料与整理材料两个层次相结合”,“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等等。说法虽异,精神却一以贯之。考证与批评本是中国传统文学研究的双翼,古今优秀学者皆两者兼通。到了现代,随着学术成果积累的日益丰厚和学术分工的日益细密,这两项工作渐渐分道扬镳。学者或长于此,或长于彼,互相隔膜,有的甚至互相轻视。在学术界大声疾呼且身体力行地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学者,程千帆先生可以说是当代第一人。幸运的是,与程千帆先生一起领导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的周勋初、卞孝萱两位先生对上述理念和研究方法也深有会心。三位先生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十分重视运用文献学的方法,并亲自做文献整理工作。如程千帆先生主编《全宋词》、《中华大典·文学典》,与徐有富老师合作写成《校雠广义》四编,周勋初先生领导点校《册府元龟》,有《唐语林校证》、《唐人轶事汇编》、《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等文献整理著作问世,卞孝萱先生点校《刘禹锡集》、《十朝诗乘》,主编《辛亥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等,三位先生的文献整理工作都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此外,三位先生在研究生培养中也十分重视文献学的训练,自1979年程先生亲自为研究生讲授“校雠学”课程以来,这门课程二十多年从未间断,业已成为南大古代文学学科最重要的传统课程之一,一

届又一届学生从这门课程中得到了文献学方面的严格训练。

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学科非常重视文学与史学的沟通,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都不自设藩篱。古代中国的学术本来文史哲不分家,因为古代学术文化本是一个整体,对它的研究也不宜只见一个侧面。程千帆先生平生治学,虽然重点在文学,但也很重视史学,他在《史通》研究上花费大量心血,即是明证;其《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等著作,可谓文史结合研究方法的经典范例。周勋初、卞孝萱两先生的研究工作也是文史兼通。七卷本的《周勋初文集》中即收入了《文史探微》和《文史知新》两种著作,仅从书名就可知其性质是打通文史的。卞孝萱先生的著作中,关于唐代诗人的年谱和评传显然都得力于其兼通文史的学术功底。更重要的是,三位先生在研究古代文学领域内的具体课题时也经常熟练地运用史学的方法,他们的学术研究都具有以深厚的史学功底来解决文学史问题的性质。

在老一辈学者的言传身教下,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中青年学者也都接受了这种学术路数,而且已有不俗的表现。张伯伟老师说:“先师闲堂针对当时各学科壁垒森严的状况,指示我从基本经典入手,并口诵‘古今只此笔数枝,怪哉公以一手持’句,以示追求之鹄的。……我逐步形成了从事综合研究的兴趣,试图从各个方面去揭露历史真相。……尽管主旨各有不同,阐述深浅不一,但贯彻于其间的基本原则,总是试图以综合的眼光加以审视。”^①王青博士说:“在这本书(指周勋初先生《九歌新考》)的影响下,我写出了第一篇略具质量的论文,而书中利用宗教学、民俗学知识研究文学问题的角度与方法深深吸引了我,决定了我以后的治学方向,至今都没有改变。说这本书影响了我的一生,一点都不为过。”^②

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的治学方法和特点已为学界所认识和肯定。程毅中先生为《周勋初文集》所作书评将周勋初先生的治学特点概括为“文献学和综合研究,体现了一种具有朴学精神的治学方法”。《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香港《文汇报》载文评论卞孝萱先生《唐代政治和小说》,认为二十世纪的唐传奇研究,在鲁迅、汪辟疆等先生之外,以陈寅恪、卞孝萱先生为代表,“从唐人传奇文中,

① 张伯伟《东亚汉籍研究论集·后记》,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7年版。

② 《〈周勋初文集〉笔谈六篇》,《中国诗学》2004年第9辑。